

慈溪七千年衍变史之十六

明代慈溪地域文化的发展(下)

周忠庆

三、文化名人迭出

自唐朝中后期经济重心南移以来，江南文化也随之日益繁荣，南宋时期包括慈溪地域在内的江浙地区已经是人才汇聚之地，而至明代更是文化名人辈出。

明代慈溪地域的文化名人，首推心学家乌斯道、桂彦良和孙应奎。

乌斯道（元末明初），字继善，号春草，浙江慈溪人，慈溪著名心学家杨简的弟子。1992年版《慈溪县志》称他“工于古文，兼精书法”。乌斯道最大的文化建树，是在从政生涯中努力实践杨简心学。明太祖洪武二年（1369年），乌斯道参与编修《元史》，洪武四年（1371年），被举荐授石龙知县，三载考满，调任永新知县。乌斯道在知县任上主要做了三件事情，即兴学校、礼贤才、重教化，充分彰显了杨简心学的政治理念；兴学校以达到通过教育传播儒学、道德教化的目的，礼遇县内隐逸不仕的贤才并举荐于朝廷，勿使人才埋没。

从乌斯道在永兴县创设节妇祠可知，他对节妇高度褒扬的态度与杨简如出一辙。杨简曾写过三首与节妇有关的诗作，盛赞节妇克安名节、秉心不二的操守。其中《题节妇方景渊母翁氏诗卷》称赞翁氏“事上孝且恭，训子慈且义”，认为“三纲人之常，吾人勿自弃。”而乌斯道的诗作《吴节妇》则表述得更加具象和直白：“忆昔嫁君时，赠我白罗帕。君脱履犹存，拭我泣君泪。泪尽帕不烂，长留篋中看。并州有剪刀，谁能剪一半。将心比罗帕，皎皎如素丝。素丝可以染，妾心终不移。”

乌斯道创设节妇祠和杨简的赞节妇诗一样，都认为守节是对纲常伦理的维护，应当予以褒扬，以起到宣扬儒家伦理道德的效果，体现了陆九渊心学和杨简心学的基本伦理观念。

桂彦良（1321—1387年），名德，号清溪，慈溪城南祝巷口人（今宁波慈城镇），心学家杨简的弟子，“善书法，行草书学晋二王和唐怀素笔法，奔放秀美”，元末乡贡进士，曾任包山书院山长和平江路学教授。明朝建立后，桂彦良以特有的文学才华和高深的心学修养得到明太祖赏识，于洪武六年（1373年）被授予太子正学，后晋升为晋王府右傅。明太祖曾称赞桂彦良为“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宋）谦，文人耳，（刘）基，峻隘，不如卿也。”桂彦良在晋王辖区绘制了《格心图》献与晋王，回朝京师时又上疏皇帝《万世太平治要策》云：“法天道，广地利，顺人心，养圣德，培国脉，开经筵，精选举，审刑罚，敦教化，馭戎狄，善贤俊，广咨访。”此策将陆九渊心学和杨简心学畅快淋漓地融入治国之策之中，故而明太祖阅后赞叹道：“彦良所陈，通达事体，有裨治道。世谓儒者泥古不通今，若彦良可谓通儒矣。”

孙应奎（1504—1586年），字文卿，号蒙泉，余姚县上林乡双河人（今属慈溪市桥头镇烟墩乡），嘉靖年间的《叙传习录后》（蔡汝南著）称他为当时的“文宗”。孙应奎出身书香门第，自幼聪慧好学，在父亲的严格管教下学业大进。早年的孙应奎“未知所以为学也”，直至遇到王守仁才知“格物”真谛，“游阳明先生之门，以交于四方同志。进闻其师说而体究之，而讲求之，始觉（其父）训言之有所由而入也。”这一年是明武宗正德十六年（1521年），王守仁“归余姚省祖堂”，孙应奎与夏淳、范引年、吴仁、柴凤、诸阳、徐珊、管州、谷钟秀、黄文涣、周于德、杨珂等七十多人前往余姚中天阁听王守仁讲学，虽然没有正式拜师入门，但由此可见对阳明心学产生了浓厚兴趣。

明世宗嘉靖四年（1525年），孙应奎遵循父亲之命，前往绍兴拜王守

仁为师。对此，孙应奎在《蕺论录引》中作了详细记录：“阳明王先生倡道越中，豪杰景从。”“应奎祇命入谒，先生留侍侧，授餐，随事发明，尽暮而退，如前者二日，先生无倦容，有终日言口不出此图之意。予闻之，心戚感焉。机不自己，乃请师焉。先生引至天泉楼，授经文至致知格物而止。示之曰：‘学问宗旨全在此四字。’然应奎未能问也。此在嘉靖乙酉岁十月也。逾月，会试，请一大夫携之过越，博入讲，以一言为训。”于是，王守仁给了孙应奎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传习录》，这是王守仁的问答语录和论学书信集，包含了阳明心学的主要内容和哲学内涵。王守仁告诫孙应奎：“知我罪我皆以此，汝必时省勿去手。”

从此，孙应奎潜心阳明心学，成为王守仁的忠实信徒和阳明心学的中坚力量。嘉靖八年（1529年），孙应奎登进士第，高中浙江乡试第八十七名和会试第四十五名。先后任礼科给事中、华亭县丞、江阴令、河南湖广学政、江西左参政、山东按察使、左右布政使、右副都御史等职。致仕返乡后，居家收徒，传播阳明心学。

明代慈溪地域的文化名人，其次当论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的进士和状元。

科举制度的实行是华夏帝国时期选官制度的巨大进步，其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明朝是科举制度发展最快和最完善的时期。明代科举考试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四级。院试在府、州、县举行，考试合格者称为秀才，其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乡试由南、北直隶和各省举行，考中者称举人，第一名称解元。会试在京城举行，由礼部主持，考中者称贡士，第一名称会元。殿试由皇帝亲自主持，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第一名状元，第二名榜眼，第三名探花。据沈毅《慈城科举

文化述略》统计，在明朝二百七十六年间，作为慈溪地域主体区域的慈溪县，科举文化极为兴盛，出了进士二百三十七人，举人五百九十九人，贡生二百六十九人，辟荐（推荐和征召）一百零四人，任子（因父兄功绩而得官）二十二人，共计一千二百三十九人，还出了名垂慈溪科举发展史的两位状元和一位探花。

状元姚涑（1488—1538年），字维东，号明山，慈溪县人，左都御史姚镛之子，自幼聪慧，博闻强记，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年），乡试考取第七名，但会试却连年不第。姚涑豪言：“读书当与天下后世争雄，长一方不足为也！”终于在明世宗嘉靖二年（1523年）的会试中高中第二名，在殿试中成为进士一甲第一名，即状元及第。

有三件事情可见姚涑的气节和品行。其一，嘉靖三年（1524年），明世宗想尊生父兴献王为皇考。姚涑不畏皇权，坚守儒家传统礼制，与杨慎等人上疏反对并赴左顺门前哭谏，激怒了明世宗，姚涑等人被贬廷杖。其二，嘉靖十年（1526年），姚涑上《论元世祖不当与古帝王同祀疏》，奏请停止朝廷对元世祖忽必烈的祭祀：“彼元世祖者，以夷主华，蕃其丑类，于夷狄信有功矣亦有德矣，中国之民何赖焉？而顾跻之帝王之列乎？”虽然上疏被礼部驳回，后因蒙古大举入侵，明世宗最终还是采纳了姚涑的建议，停止祭祀忽必烈。其三，嘉靖十二年（1533年），明世宗诏令姚涑参与修撰《明伦大典》，为生父兴献王正名，姚涑深以为耻，坚决拒绝。

姚涑曾任翰林院修撰、经筵讲官、左春坊左谕德、侍读学士。嘉靖十七年（1538年），姚涑病逝，姚涑辞职奔父丧，因为悲伤和劳累过度，竟死于家中，年仅五十一岁。天启《慈溪县志》记载：“闻，上震悼，命谕祭在五品翰林，称为异数。”

状元杨守勤（1559—1620年），字克之，号昆阜，慈城人，自幼刻苦好学，博览群书，尤精《诗经》。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杨守勤在乡试中名列前五名，夺得经元，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在会试夺得会元，在殿试中考取第一，是为状元，时年三十八岁。杨守勤在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堪称明代科举史上的奇迹，慈溪县为此在县衙的丽泽桥上竖立三元坊，以志褒扬。

大魁天下后的杨守勤做了两件事情。其一，给当年已经在淮扬当地为官且鄙视自己的同窗好友作诗相赠云：“萧萧行李上长安，此际谁怜范叔寒。寄语江南贤令尹，姓名须向榜头看。”其二，在朝仅两年后，杨守勤就回到家乡慈溪县，直至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才“补原职”，历时八年。原来父亲病故后，他回家服丧并按例丁忧，继之奉养老母，母亲病逝后又守丧三年。

杨守勤曾任翰林院修撰、顺天乡试主考官、右谕德、会试同考官、右春坊右庶子兼侍读等职。据光绪《慈溪县志》记载，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杨守勤升为右谕德，充东宫讲官，姿态优雅，气宇轩昂，声音宏畅，太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总是静静地聆听状元老师讲述古今成功与失败的历史事例。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杨守勤在家乡去世，明廷追赠詹事府少詹事，入祀郡、邑先贤祠。

探花袁炜（1508—1565年），字懋中，慈溪袁马村（今属余姚市）人。在明世宗嘉靖十七年（1538年）的会试中高中第一，即会元，在殿试中考取一甲第三名，即探花。袁炜曾任翰林院编修、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极殿大学士，入阁典参机务。袁炜在朝善于揣摩皇帝心思并曲意迎合。《明史》记载：“（天象出现日食），（袁）炜乃阿帝意上疏言：‘陛下以父事天，以兄事日，群阴退伏，

万象辉华。是以太阳晶明，氛钁销烁，食止一分，与不食同。臣等不胜欣忭。’疏入，帝益喜。”明世宗养的猫死了，命儒臣写祷告词祈福。袁炜的祷词有“化狮作龙”之语，明世宗非常高兴，“以故帝急用之，恩赐稠沓，他人莫敢望。”世人将袁炜和袁、郭朴、李春芳戏称为“青词宰相”。

还有一位值得一提的是嘉靖五年（1526年）高中武会试第一（即武状元）的孙熹。他是慈溪现境唯一的状元，《慈溪七千年衍变史》系列将另外撰文论述。

此外，慈溪地域被写入1992年《慈溪县志》的进士有十六人。他们是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陈猷宗，正统十年（1445年）进士夏时正，成化八年（1472年）进士张燧，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孙燧，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姚镛，正德六年（1511年）进士孙懋，正德十六年（1521年）进士刘世龙，嘉靖五年（1526年）进士冯岳，嘉靖八年（1529年）进士赵文岳，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进士颜鲸，天启三年（1623年）进冯元胤，崇祯元年（1628年）进士冯元胤，崇祯四年（1631年）进士熊文燧，崇祯十年（1637年）进士孙嘉绩，崇祯十三年（1640年）进士沈宸荃，以及崇祯十六年（1643年）进士冯元胤。

明代慈溪地域进士熟读儒家经典，常怀“齐家治国平天下”之志，大多知书达理，人品高贵，为官清正，只有赵文岳因品行不端且认内阁首辅何臣为父，留下了恶名。

总而言之，明代慈溪地域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发达，致使科举文化逐渐兴盛，位列东南沿海各县之前茅。明代慈溪地域文化的繁盛，为慈溪地域文化在清代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鸦片战争后的近代化转型，奠定了文化基础和人才基础。

溪上人物

听说过之佛先生有长女陈雅范在台湾，做乱针绣，去年十一月有“甘露泽降”陈氏二代画展赴故乡在故居展出。

画展的热点是乱针绣，陈雅范和她女儿的乱针绣作品琳琅画廊。但除了绣，也有画。一幅写意山水，岛渚之上，暮云寒林，宋元笔意，让我们认识了陈家家公子嗣雪先生不凡的中国画造诣和大气的山水笔墨精神。数幅工笔花鸟，家传的工笔兼写花鸟功夫深厚纯正，不但有其形，更传其神。嗣雪先生次女蔡文恂女士还带来了数量可观的水彩作品，色调热烈缤纷，带来更多域外多姿情味，同时又不乏含蓄典雅亲和之作。

对于乱针绣，我是一团乱麻。最初读高尔泰散文《广陵散》，才晓得早年苏州丹阳正则艺专有个小老太叫杨守玉发明了乱针绣，那是谜一样的乱针绣。“她所创造的画种‘乱针绣’，是用针线代替画笔和色彩，在布上作画无数不同色彩不同长短的丝线，不规则地相互横斜交叉错综重叠，近看一片混沌无序，远看人物风景生气洋溢光影迷离，画法有点印象派的点彩，但要用点彩法临摹它根本不行。它的每一幅都是独特和不可重复的，无论是深巷里雨滴落日的余晖，灯影暗处的裸女，雨中的树或者阳光下灼灼生辉的一团黄花，都像是不久就会消逝的东西。”作者在文中把乱针绣当作无人继承的“广陵散”了，虽然于事不合，却更有了叙事的诗意。

但孤陋如我，乱针绣从未尝见过。直至这次展览，直至我读到了陈雅范和她女儿文恂编著的《飞针走线》，我对乱针绣才有了感性和理性的认识。

民国初年，精于西画，亦写人物、山水、花鸟的杨守玉教授，有感于中国刺绣技法过于呆板，她将西画素描的基础，用之于刺绣的技术上，主要采用长短交叉的线条，以分层加色手法来表现画面。西方透视法与中国刺绣针法的融合，创新了刺绣的新方法，研究发展成了一种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乱针绣”，改变了刺绣的生命。在绣法通于画法、针法通于笔法的原理下，产生了一系列的新艺术，是中国刺绣史上的一大革新，从此中国刺绣突破工艺的樊篱，走向了纯粹艺术创作的途径。

乱针绣为什么要加上一个“乱”字呢？因为这种刺绣的特色是着重于线条的变化，乍看起来线条很乱，其实乱中有序，有它一定的针法原理，或粗或细，或长或短，纵横交叉堆砌皆有脉络可循，绣法通画法，乱中皆有其道理。

陈嗣雪扔下美术十多年之后才拾起乱针绣。

“一九四九年（民国三十八年）三月，随着外子的工作单位，一家三

口乘坐‘海张轮’迁来台湾，离乡背井……一九五二年外子考取第一届留美军官，前往受训，那时候我们住在南港兵工厂宿舍。我由一个无忧无虑的家中娇女转变为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刚到台湾初期，生活条件相当差，做饭，洗衣，剪裁车缝，编织毛衣，剃头，整修房屋油漆，为了节省开销，每一件都必须自己动手，也可算是双手万能，只是于艺术无缘。唯一让我纾解生活压力没有和艺术脱节的，便是偶尔去台北的中山堂看看书画展览。一九六二年，父亲突然在南京过世的消息辗转从香港的友人处传来台湾，这个噩耗令我悲痛欲绝，同时像一记重锤打醒了我。我开始思念着父亲的一切，父亲开始专攻工笔花鸟画时，以号‘雪翁’为署名，而我的本名叫‘雅范’，父亲在我进入中大艺术系时，特别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嗣雪’。”

一个女子，忍受丧父的悲恸，在海峡彼岸，抑制无法奔放的遗憾，开始着手进行疏离了十几年的艺术创作。陈嗣雪绣的第一幅乱针绣作品是《和平的障碍》，挨着铁丝网张望的两只和平鸽，带着暗色调的凄楚和哽咽。接着她开始尝试绣人像，“是亲情的感召吧，从来没学过如何绣人物的我，凭着身边仅存的一小张父亲的照片，拉回了鲜活、浓郁的回忆，心中惶恐之至，完成后我请父亲的高足傅狷夫兄批评，他说神态逼真，也许这就是父女连心的缘故。第二幅作品的成功，不仅使我的信心增长，创作的胆子更壮大了，于是各种题材便在灵活的运针下一幅一幅地完成，五年里完成了以作品纪念父亲的心愿。”一九六七年在台北新公园的省立博物馆举行第一次个人画展。这个博物馆在六十年代是最好的艺文展场。一个弱女子，一个奇女子，足不出户，五年时间，五十幅乱针绣作品在眷村诞生。眷村，南港兵工厂宿舍里沸腾了，“想不到我们眷村里真是卧虎藏龙！”展览结束，虽然一炮而红，回想筹备展出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令她心酸，虽然喜悦，但内心的哀痛，却渴望痛哭一场，当时她写了一封“永远寄不到的信”给亲爱的父亲，向他告白女儿没有辜负他的赐名“嗣雪”。她觉得自己像一盏熄灭已久三月，随着外子的工作单位，一家三

飞针走线嗣雅范

吴铁信

陈嗣雪在《飞针走线》开篇中就说：“造就一个艺术家必须具备的两个因素，先天的与后天的……何其有幸上苍很慷慨地把两个都给了我。”第一个因素，不说了，因为她是陈之佛的女儿，而且母亲的文红也特别好。于是从血缘深处升起了一股自豪的情感，这种情感的觉醒对于陈嗣雪来说是很重要的。她此后的人生态度中始终没有失去中国人已化为血缘形式的情操——气节和骨。从小生长在艺术气息浓厚的环境，耳濡目染，“我从三岁开始便喜欢涂鸦，听说我曾画过一个椭圆形东西，就是爸爸的茶壶，父亲高兴极了，夸我长大后能当画家，那时候我画的图画都被父亲收集起来，后来他编写儿童图画书籍时还用了上去。从有点懂得看画开始，父亲常让我当他的跟班，随着他参观各种艺术展览。我会和乱针绣结下一世一生的缘分，也是因为在我父亲带我去参观全国美展时，看到杨守玉的创作，她以绣作画的特殊艺术表现，深植我心，但那时我只有十一二岁。抗战爆发，翌年一月辗转回到重庆，去吕凤子创办的正则刺绣专科学校学画，跟我向往已久的杨守玉老老师学乱针绣。乱针绣是一种绘画与刺绣息息相关的艺术创作，为了打好绘画基础，我又转到中央大学艺术系，第一年以理论课与素描为基础。第二年由于我偏好石涛的山水与父亲的工笔花鸟，选修了中画组。”陈嗣雪坦率地说，教授山水的黄君璧和教授花鸟的谢稚柳并未对她的学画历程造成深刻影响，她很幸运在家中可学到更多、更仔细的技法，她既是之佛先生的小跟班，又是小书童，磨墨也好，换水也罢，在画桌边伺候的时候，可以仔细地观察父亲如何用笔、用色。父亲常叮咛说，“色要艳而不俗，淡而有情，工笔画更是美在线条，须柔而有力。”这些话陈嗣雪记了一辈子，后来都运用到了乱针绣上。

1991年，在第一次个展的四分之一世纪后，陈嗣雪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举办了七十回回顾展，展出了七十幅新作，还出版了台湾第一本介绍乱针绣的《飞针走线》。

无论之佛先生的工笔画，还是嗣雪先生及女儿的乱针绣，都推陈出新，中体为用，洋为中用，从工艺走向了纯艺术的高尚之路，也正是陈嗣

雪与其父的共通之处。“雪个已矣困香死，三百年来或在斯。”陈之佛那清新隽逸、雍容典雅的独创风格，远绍徐黄，直登宋元堂奥，并受明代吕纪、清代恽南田的影响，既博采众长，又独树一帜，把传统的花鸟画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他善于汲取历代花鸟画的精华，在用笔、用墨、用色上极为讲究。又大胆运用西洋的解剖、透视等科学表现方法，以及构图色彩的形式法则，以加强花鸟画的艺术效果。陈之佛认为花鸟画和其他的画种一样，首先要求画家有健康的思想感情，在提高思想水平的同时还必须注意提高艺术水准，要有一定的表现能力，个人的精神体验和深刻的感受才能在相当娴熟的笔墨形式中体现出来。他的作品，既没有院体柔媚拘谨，也不受文人画狂怪的影响，却蕴其抱朴含真旷逸空灵之美。1934年，他以“雪翁”署名的花鸟画在南京中国美术学院第一届展上展出，引起轰动。1935年后，陈之佛开始专攻工笔花鸟画。1942年3月1日，又在重庆首次举办了个人作品展。“陈之佛确实是一位具有世界性眼光和视野的一代文化巨人，不仅在20世纪上半期，即使在现在，也是不可多得的文化精英。”雅范虽未专攻工笔花鸟而选择乱针绣，但从小多受父亲影响教诲，在乱针绣之路上同样走着传承和创新的道路。乱针绣本身就是中国刺绣的创新，而乱针绣的发展又需要海峡两岸各家进行独具个人魅力的再度创造。近代发明而于现代光大的乱针绣，标志着刺绣从闺阁中走出来彻底解放——从实用绣、“闺阁绣”发展为纯供欣赏的艺术品。在创新技法上，除了针法的变化外，还能够求助于材质的变化，目前的创新有铺棉绣法、绕丝绣法、衬托绣法、留色绣法、虚实绣法、拼布法等。中国的刺绣一步步走向了纯艺术化的道路，因此乱针绣也是中国刺绣纯艺术化的产物。艺术上的使命感和迎难而上也是父女共通之处。自1931年起，陈之佛先生在教学中之余挤出时间专攻工笔花鸟画，当时他已近不惑之年，在工艺美术上颇见盛名，毅然改变方向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自从文人画盛行以来，“逸笔草草”的作品风靡一时，工笔画寥寥若晨星，面对明清以来中国花鸟画的颓废，他有心力挽

颓风，振兴这一艺术。陈雅范也如此，重拾艺术也是到了她年近不惑，她说：“我是该专心于绘画，还是刺绣？由于当时从事绘画的人才太多，而近半世纪来刺绣的发展一直无法突破，没有创新，最后我选择了乱针刺绣，我下定决心，要在台湾将乱针绣发扬并引领到一个新的境界。”传统刺绣给人的印象是工细、平实、整齐，一般常见的如平针绣、双面绣等。而乱针绣给人的感觉是活泼自由，技法上打破旧有的排笔针法，绣者可以自己创意的构思与技巧去表达。陈雅范打破常规，创冲东西，大胆地采用间色线法，运用“色彩学”类似色与补色原理，来增加绣面色阶的层次和丰富的色感，更突出乱针绣和其他刺绣的不同。在技法上，研发出绕丝、铺棉等方法，作品绣成之后极具立体感，色感强烈，线条优美，并可表现出渲染、虚实效果，与现代绘画艺术有异曲同工之妙，把乱针绣提升已趋向于复合媒材的运作。乱针绣与油彩、水彩、水墨等画法结合，又可创作出新的作品。乱针绣技法与特色是“活用针线”，迷人处和困难度是对等的，不仅需用敏感的头脑、灵巧的双手，更少不了敏锐的观察力。虽然创作过程辛苦磨人，但最后得到的却是满心喜悦。刺绣在传统历史中渐渐发展成符合现代风味的艺术，这就是陈雅范以一生心力为之奋斗了五十年的乱针绣。

不知当时远隔大陆的陈雅范是否知道，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她的父亲陈之佛除了继续他的工笔画创作，又投入了中国传统工艺美术的抢救和投入工作。在他的多次呼吁下，江苏省成立了“苏州刺绣研究所”，亲自为苏绣画绣稿，《松龄鹤寿》《月雁》《石榴群鸭》等作品是其中的代表作。陈之佛集工笔工笔和教学于一身，他是三位一体的大师。而海峡彼岸的陈雅范在得闻父亲的噩耗后坚定了走苏绣奇葩乱针绣的道路，两岸音讯阻隔，这是冥冥之中的暗合和呼应吧？《松龄鹤寿》初稿是陈之佛1959

年的力作，通幅笔法精奇，气势磅礴，是他生平罕见的巨制。28年后，为纪念乃父，陈嗣雪七秩之年以此为底稿飞针走线绣了四连屏巨作，工笔和写意的结合，运用创新技法——更为重要的是，又昭示了“嗣雪”的意义，此作正是长女嗣雪继承乃父尚美精神的物化。

陈之佛说过，他的第一职业是教书。当年广州美专的几十个学生紧随他的脚步，他走到哪里，他们跟到哪里，可见他为人师表的人格魅力。同样，在海峡彼岸，陈嗣雪嗣后做着继续雪翁尚美而甘苦的事业。1992年，陈嗣雪应邀在台中省立美术馆举行乱针绣推广展，由教育部主办暑期高中高职教师“乱针绣培训班”。2003年9月，陈嗣雪在台北信义社区大学指导教授乱针绣，继而在在内湖社区大学教授，两地学员超过百人。陈嗣雪和蔼可亲，有教无类，社区大学的学员都非常喜欢“外婆”陈老师。

高尔泰在《广陵散》文中最后说，“从此乱针绝技，终于广陵散绝。”文章这么收场，妙绝，但事实上乱针绣并未“广陵散”，传衣钵者虽不多也可谓不少，陈雅范就是其中一例。雅范有女，蔡文恂蔡文恂姐妹皆传其衣钵并致力于推广传习乱针绣。文恂从事传媒，退休后也习乱针，让人感叹非专业人士也绣出如此高难绣品，莫非是遗传效应？蔡文恂，台师大美术系毕业，原习水彩，为承母亲衣钵改学乱针绣，是雅范的学生又是她力助的助教。乱针绣，可写意空灵，可工笔写真，以绣代画也可绣画综合。绣画综合，以乱针刺绣绣出主体，再用丙烯（亚克力）画的方式绘出背景部分，不同材质的相互运用产生浮雕立体效果，更显出乱针绣的层次感。然天不假年，清明时节我在文恂作文之初突闻噩耗，陈之佛之后蔡文恂女士已于清明前夕在台不幸去世！天哪！天下哪有这种催稿的方式？孰可逆料孰可想象？让我的笔头为之怅惘郁闷失控，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去年岁尾，她与姊文恂共同完成了母亲的一个遗愿，在母亲出生的地方，在外祖父陈之佛先生的老屋，展出一家三代绘画和乱针绣作品，并向陈之佛艺术馆捐赠作品。除了乱针绣，还展出了文恂女士较多数量和高质量的水彩画，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得到慈溪画界的一致首肯。她是一位热情爽朗不知疲倦的艺术家，我们自己老家！泚山晓记弄是她的外婆家。然这竟是她最初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展览，不，我愿意看到她的遗作重回她的故里！向以为中国书法中国画是国粹，今日观之，苏绣乱针绣又何尝不是！

本版投稿邮箱 939901613@qq.com